

“九一八事变”后清华师生之义举

○蔡乐苏（教）

1931年9月18日深夜，蓄谋已久的日本侵略者在沈阳一个叫柳条沟村的地方炸毁一段铁轨和枕木，然后诬称驻沈阳北大营的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路、袭击日本守备队，进而向毫无戒备的北大营中国驻军发起进攻。19日晨，日军占领沈阳城，同时侵占了安东，并相继侵占营口和凤凰城。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尽管当时的中国政府采取的是忍让退避的方针，且对人民的抗日活动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抑制和约束作用，但人民的爱国激情终究是压抑不住的。“九一八事变”后一年多的时间内，清华师生的抗日爱国言行大致可分为迅即组织、宣传呼吁、演讲不断、多次捐款与请愿劝导等五个方面。

一、迅即组织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清华学生即成立了抗日救国会，北平各大学教职员拟组织教职员联合会，研究办法，领导民众，声援政府。9月21日上午11时，清华教职员公会临时召集紧急会议，九十多人参加。著名教授冯友兰主持会议，会议议决由清华教职员公会组织常务委员会，定名为“国立清华大学教职员公会对日委员会”；推举张子高、蒋廷黻、钱端升、张奚若、冯友兰、陈岱孙等17位教授为常务委员；会员除交本年会费（每人一元）外，再捐助个人薪金的百分之一，由会计科代扣。当日晚9时，

“教职员公会对日委员会”于工字厅后厅举行会议，推举冯友兰为主席。

1932年9月30日，教职员公会选举新一届对日委员会委员，人数改为11人，上届委员可连任。经投票选举选出新一届委员：冯友兰、叶企孙、章晓初、萧叔玉、蒋廷黻、张子高、吴有训、何清儒、浦薛凤、王化成、钱端升等。10月18日下午4时，由教职员公会干事会召集对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推选主席，讨论会务。

二、宣传呼吁

“九一八事变”后，清华师生迅速开展各种宣传活动，向民众、政府和国际社会传播相关信息，呼吁抵抗、遏制日本侵略行为。仅从学生抗日救国会公布的捐款



“九一八事变”后第三天，清华成立教职员公会对日委员会，师生即开展各种抗日活动。这是发表在《清华校刊》上的有关会议记录

□ 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

支出清单中，即可看出当时在宣传呼吁方面的活动力度。据 1932 年 2 月 19 日《国立清华大学校刊》（以下简称“校刊”）公布的数字，在总支出的 1218.90 元中，宣传股就用去 772.34 元。

9 月 24 日，教务处通告：本日全体学生分道至附近乡村讲演东北问题，特许停课一日。同日晚 8 时，冯友兰主持教职员公会对日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定：组织宣传股，负责编印英文小册，将此次日本强占东北事件之真相宣示世界各国，会议还议定了《清华大学教职员公会对日委员会致国际联盟理事会电》。

11 月 7 日，《清华周刊》第 36 卷第 516 号特辟为“对日问题专号”，扉页印有民族英雄岳飞劲书之“还我河山”四个醒目大字。此期《清华周刊》的篇目有：《论救国之道》《抗日声中国人亟应痛改之一种错误心理》《外交上的觉悟》《对日方案摘录》《吾人对于国际联盟会应有之认识与觉悟》《东三省事变之回顾与前瞻》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文章对当局的“不抵抗主义”明显是反对的，是充满着愤怒的。同时，对那种过于指望国联、依恃美国的错误心理也给予有力地拒斥。

11 月 9 日《校刊》登载《爱国报》编辑部启事，说该报“是为我们苦同胞解决一切问题的刊物。不识不知，造成我们的贫弱和散漫。怎样使他们知，便是国强民富的先声。所以抗日救国是本报的初衷，增民知，扬民气，是我们认为必经的大道”。

1932 年初，东北形势更加恶化，引起各方面严重关注。2 月 8 日，《校刊》刊出《学生会抗日救国委员会启事》：国难会议举行在即，凡我国民，均有发表意见之权利



清华为抗战官兵赶制防毒面具

与义务。本校同学，如有高见，请交三院二十号，由本会汇交本校出席国难会议委员，以便于会议时提出。凡我同学，均希注意。3 月 2 日下午 4 时，教职员公会在生物馆召集全体大会，当即议决：以教职员全体名义，致电政府，反对撤兵、妥协及设立中立区，敦请政府出兵收回东北失地。

1933 初，日寇侵占热河，华北震动。清华师生对政府抵御外侵如此无能，愤慨万分。冯友兰等五位教授认为，热河失守事件，对政府必须表示意见，于是联名提请召开教授会临时会议。3 月 9 日下午 4 时，临时会议举行，到会者分别发表意见，讨论结果通过议案：（一）致电国民政府；（二）推举张奚若、冯友兰、燕树棠、萧叔玉、浦薛凤为电文起草委员会。3 月 13 日，《校刊》刊出《国立清华大学教授会致国民政府电》，敦促国民政府抵御外敌。

三、演讲不断

事变发生后，清华校内安排了多次专题演讲。演讲以本校教授为主，兼请校外教授；既有历史与理论的分析，也有现实战况与国际形势的介绍；纪念日的利用与校方的高度重视更使这些演讲增添不少独

特的影响力。事变发生后第三天，教职员公会常务委员会就建议学校敦请本校教授演讲中日问题。在拟成立对日委员会的紧急会上当即议定：请蒋廷黻先生于9月22日晚8时在生物馆楼下133教室讲《日本侵略行动之经过与背景》；请萧叔玉先生于24日晚讲《日本在东三省之经济势力》。

11月23日下午4时，学生会抗日救国会请陈启修先生演讲，题为：《当作日本帝国主义承续了的东三省，当作中国经济因子看的东三省》。

1932年1月4日《校刊》登出蒋廷黻先生讲演纪略：《英美舆论界对于东北事件之态度》。同日，钱稻孙先生演讲《日本政党问题》，梅贻琦校长主持。

1月11日，学校邀请燕京大学黄宪儒教授讲演《抵制日货问题》，教务长张子高先生主持。

2月12日《校刊》“专载”，刊登蒋廷黻先生讲演纪略：《国难会议的使命》。



朱自清等清华师生组成“绥远抗战前线服务团”慰问抗战官兵。左三为朱自清，左五为九级同学王达仁，右一为范长江，范当时是北大学生（1937年）

2月26日《校刊》“专载”，刊登郑振铎先生讲演纪略：《我所见的上海战争》。

2月29日上午11时，中文系刘文典教授作题为《东邻野心侵略之计划》的演讲，梅贻琦校长致词。

3月18日，学校举行“三一八”国耻纪念会，特邀阎宝航先生来校讲义勇军在东北活动情形。

3月21日，特邀何海秋先生讲《沪战之影响及教训》。

5月9日又是国耻纪念日，学校举行国耻纪念仪式，特请蒋廷黻、王化成两先生，讲述“五·九国耻”的意义，及其条约内容的变迁，我国所受的影响等。蒋先生全面讲述了“二十一条”的始末，接着王先生讲《满洲问题》。王先生十分伤感地说：

“17年来，年年开会纪念国耻，而我们的耻不但未雪，而且有增无已。真是耻不胜耻！……现在有一班的人，专想国联（国际联盟简称）替我们出气、美国替我们打仗，这都是一种取巧与苟安的心理！决不会有好结果的！中国的事，还是要靠中国人！”

9月18日，正是“事变”发生后一周年，上午10时，全校在大礼堂举行国难纪念会。特邀自东北来北平的王化一先生与本校冯友兰教授演讲。梅贻琦校长首先致词，他沉痛而又满怀希望地说，现在吾人为失东北而悲，且更进为国家前途而悲。以拥有重兵的国家，坐视敌人侵入，毫不抵抗。公然勇于内战，怯于对敌，何等令人失望！

□ 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

王先生讲演，悲壮痛切，令人振奋。讲毕复请冯友兰先生讲演。冯先生以哲学家之卓识，历史地预见了“九一八”东北事件，在近代史中，实是一个空前的大事件，不但为中国之国难，且引起全世界的大恐慌。世界大战之开演，或即由此爆发，而成为最严重的事件。

9月22日下午4时，朱子桥、查勉仲两先生来校演讲。这次演讲的直接目的是想获得清华师生的抗日捐助。

四、多次捐款

随着东北、上海战局的变化与前线将士、伤兵、难民等的急需，清华师生满腔热情、接连不断地组织多种募捐活动。1931年11月，日本侵略军集中大批兵力北犯黑龙江省，马占山将军不顾“不抵抗”的禁令，率部奋起抵抗，在嫩江江桥一战重创日军。消息传到清华，师生感奋无比。11月17日，教职员公会向日委员会在《校刊》上登出启事，由本校教职员捐资千元电汇黑省，慰劳卫国战士。

当教职员公会向日委员会向马占山将军汇出捐款之时，清华学生抗日会亦发起募捐活动，12月25日《校刊》公布共募得国币925元整，清单中列出捐款者612人的姓名及其捐款数额，其中捐得最多者为梅贻琦校长，捐20元。

日军侵占齐齐哈尔之后，调头转向辽西，进攻锦州。1931年12月21日，日军向辽西地区发起总攻，其大会战姿态为“九一八”以来所未有。1932年元旦，日军进攻锦州。中国军队虽最终放弃锦州，但战斗中伤亡惨重，许多伤病人员来到北平等待医治。1月25日，清华教职员公会

向日委员会在《校刊》上发布启事，拟向本校教职员同仁募集捐款，慰劳来平伤兵。

日本侵略者侵占东北后，又蓄意在上海制造“一·二八事变”。在日本侵略强盗的多次疯狂进攻面前，中国守军奋起抵抗、不畏强敌的气概使中外坚持正义、爱好和平的人们无不为之感动。1932年2月8日，清华《校刊》报道：《教职员捐款慰劳拒敌沪军》，“本校教职员公会筹集捐款五百元，于本月六日汇往上海，慰劳该军将士。兹将去电录左：上海吴铁城市长转十九路军全体将士勋鉴：淞沪御敌，振国家之声威，转世界之视听。全体国民，极深感佩。同人等谨捐薪五百元，由大陆银行汇交贵军，藉表慰劳微诚，仍祈继续努力！”同日，教职员公会又续汇慰劳沪军捐款五百元。

与教职员公会相比，学生捐款的难度要大许多。教职员捐款，通过决议后，即可从薪金中扣收，而学生只能靠散捐，故数额比较有限。2月19日《校刊》“附录”公布的黄仕林报告经手账目及捐款名单中，列出同学捐款只得210元，是由360名学生捐出的，其中多者5元，少者1角。后来，学生抗日会改善募捐办法，在向学生募集散捐的同时也向教师募集散捐，募得数量明显增大，慰劳沪、哈抗日将士所得捐款共计630.56元。

直接向前线将士捐款，目的在鼓舞士气，提高战斗力，但当时淞沪伤兵缺少医药费，更亟需支援。消息传来，清华师生又迅速行动起来。3月1日，教职员公会对日委员会开会，决定由本大学教职员公会每月捐薪五千元，暂以三个月为限，共计一万五千元，专作救护淞沪伤兵医药费。

因拟捐款数较大，又非首次，故对日委员会认为事关重大，必须经过教职员大会通过，以昭慎重。于是，3月2日下午4时在生物学馆大讲堂召开教职员公会全体大会。会上一致通过对日委员会提议的捐款数量、用途和方法。

但当第一次款捐出后，上海战事即停。教职员公会对日委员会又开会讨论，大家以为，上海战事随时可能再起，故仍遵守大会议决案，将已收之捐款，活期存入大陆银行，以便于必要时可及时取出，交协和救护队备用。如果战事不起，此款将作何用途，尚须经大会决定。

淞沪方面的捐款刚刚结束，东北方面又出现大量难民需要救济的问题。这时教职员公会对日委员会虽已多次组织捐款活动，但仍一如既往。9月27日，对日委员会召集会议，拟由同人再合捐一万元，救济东北难民。为使捐款尽快发挥作用，拟先请学校代为筹垫，早日汇出。学校所垫款项，拟分四个月在同人薪水项下分别扣还。

教职员如此慷慨，学生亦不甘后人，不过他们必须投入更多的精力，想出更好的办法。《校刊》10月19日公布《学生抗日会救济东北难民音乐会募捐收支报告表》：“红票，每张六毛，共163张；蓝票，每张三毛，共250张。与支出相抵。”10月28日公布：《学生会干事会募款捐助东北义军账目》。1933年2月23日刊登《学生自治会抗日会会计股启事》，公布抗日会先后共募得洋628.03元整，并将捐款人之姓名详列于后。

五、请愿劝导

在“九一八事变”后清华师生的抗日

爱国言行中，请愿与劝导更为激动人心。请愿既有向校方的请求，更有向政府的请愿；既有学生的请愿，亦有教师的请愿。劝导既有教授的劝导，更有校方及政府的劝导。请愿是抗日爱国的举动；劝导同样发乎抗日爱国的恳诚。当事变的消息刚传到学校时，学生自治会即函请学校停课三星期，以全时间实行军事训练，为投入战争作实际准备。拟所缺功课于寒假、春假补足。校方当即电达教育部请示，教育部同意加紧军事训练，但不许占全时间，并提出临时办法。

随着东北局势的急剧恶化和对政府“不抵抗主义”的极度反感，青年学生必然要冲在前面，表达自己的愿望。11月23日，学生会代表向校方当面提出：学生会大会“决定于今日全体赴京请愿”。校方感到情况甚为紧急，命校务会议立即发布公告，劝阻学生赴京。

校方的劝阻没有完全发挥作用，部分热情奔涌的学生坚持原议，离校赴京。面对此种情形，校方并未严词责备，而是采取通融措施，既对学生行动表示理解，又设法不使学生学业遭受损失。

国难来临，情绪激昂者并非只是学生，教师亦有奋不顾身表达自己意志者。原清华国学院学生、梁启超高足、已留校任教的吴其昌先生，就因痛愤黑龙江省的失陷和政府的失责，携全家（妻子与弟弟）绝食，赶赴南京请愿。教师举家绝食请愿，此事非同小可。吴其昌一抵南京，教育部长李书华即出面劝慰，帮助安排住处，引领得见蒋主席后，吴同意复食回校。

师生南下请愿的风波使校内无法平静。学生为迫使学校停课，以便参加各种抗日

□ 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

活动,有故意不上课者,有围逼教授停课者。教授们苦口婆心地劝导,终究不过各地学生涌赴南京请愿热潮的影响,教育部一再电令禁阻亦无济于事。张学良副司令也告北平各校同学,劝阻学生请愿,可这时候的学生怎么能听得进去呢?

尽管请愿风潮闹得风风火火,但绝大部分教师仍坚持上课,因此学校教学秩序未受过分冲击。正如梅贻琦校长在新学期

开学典礼上所说:“过去一年间,正值国难临头,风云紧急的时期。但国势虽如此危急,本校教务功课各方面,均尚能正常进行,未因时局关系而致稍有停滞。”梅校长勉励同学们,在新学期努力从事实上研究怎样可以得到切实有效救国的方法,帮助国家做种种建设的事业。正是在梅校长这种思想的指导和鼓励下,清华师生开始加紧了防毒面具和航空等方面的研制工作。

抗战救国的时代强音：西南联大 与战时国际广播

○戴美政

编者按 戴美政,云南西南联大研究会副会长、云南师大特聘研究员、云南广播电视台高级编辑。从事西南联大历史、文化研究多年,成果丰硕。本文是他最新的成果。为完成此项研究,他在云南省档案馆,调阅“昆明广播电台档案”共150余卷,逐页查检,摘录30余万字。本文所

引内容均出自该档案,限于篇幅,不再逐条注释。

中国抗日战争是中国广播事业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爱国人士运用广播武器宣传抗战、促进民族觉醒、进行国际交流、推动抗日救国的特殊历史阶段。1940年8月1日开播的昆明广播电台,是为抗战国际宣传而建立、战时中国功率最大的广播电台。除国语广播外,该台先后开播的外语节目有英语、法语、缅甸语、越南语、日语、马来语、泰语等,汉语方言节目有粤语、厦门语、台湾语、沪语等四种。其中,西南联大师生参与或主持编播的外语节目有英、法、日、马来语四种,汉语方言有粤语、厦门语、台湾语等三种。昆明广播电台借助西南联大的思想、学术、人才的优势,全力进行反侵略的电波战,办出了中国抗战广播的高水平,为抗日战争与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昆明广播电台大发音室现貌,戴美政摄于2015年1月23日